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古今通论

古代通论

世界史论

当代三农

现实问题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先秦通论

原始经济

文明起源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汉唐通论

战国秦汉

秦朝秦代

西汉东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宋元通论

唐宋通论

北宋南宋

辽金西夏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明清通论

明代通论

明中后期

清代通论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近代通论

清代晚期

民国通论

民国初年

国民政府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近世通论

现代通论

前十七年

文革时期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学科发展

专题述评

国学网 - - 中国经济史论坛 / 近代史论 / 红色区域 /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绪论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绪论

2006-12-03 黄正林 高端扫校 点击: 1003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绪论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绪论

黄正林

一、边区经济史研究现状

对于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的研究，可以说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了。当时中共的一些领导人、西北局或边区政府各部门就发表了许多关于陕甘宁边区经济问题的文章或调查报告，如谢觉哉、左健之《关于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的几个问题》，是抗战时期比较早的研究边区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章，主要论述了边区的土地关系与农民小商品经济的发展、边区农村资本主义经济即富农经济及其剥削方式、边区政府的农村经济政策等问题。^①毛泽东1942年12

^①《解放》周刊第119期，1940年11月16日。

月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是一部比较全面论述经济与财政关系的论著，毛泽东一共讲了关于发展边区经济的9个问题，包括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社、盐业、自给工业、军队生产事业、机关学校生产事业、粮食工作等。就在这篇论著中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的著名论断。^①还有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等著作以及当时《解放日报》等边区创办的报刊发表的一大批新闻报道或研究文章。这些论著中，许多既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又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为我们现在研究陕甘宁边区经济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可供借鉴的研究方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根据地史的研究，正如魏宏运教授所说：“50年代和60年代，‘左’的思潮影响了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学者们很少涉足这一领域，出的成果不多。”^②陕甘宁边区史的研究也一样，没有出多少成果，而边区经济史研究的成果更少。

20世纪80年代以来，陕甘宁边区史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就经济史的研究而言，不论是资料整理还是研究成果都有了新的进展。在资料整理方面，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合编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共9编，包括总论、农业、工业交通、商业贸易、金融、财政、互助合作、生产自给、人民生活，是第一部全面反映八年抗战期间边区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成就的大型资料；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合编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共10册，是一部反映陕甘宁边区工商税收的大型资料，上起1935年，下至1950年4月。涉及边区经济史的资料还有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共14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共5辑，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等。一些部门编辑出版了与本部门相关的经济资料，如延安地区供销合作社、延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编《南区合作社史料选》，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中国人民银行延安市分行编《黄亚光文稿和日记摘编》，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编《陕甘宁边区金融报导史料选》，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编《朱理治

学者学术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史观史法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金融论稿》等。从史科学的角度来看，陕甘宁边区的史料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

①《毛泽东选集》卷5，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47—888页。

②魏宏运：《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

在研究方面，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出版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论著。星光、张杨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是第一部关于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的论著，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该书“以丰富的资料比较翔实地反映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所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记述了边区财政经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半自给自足达到基本自给自足的发展过程，以及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和经验教训”（见该书序）；财政部税务总局编的《中国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长编——陕甘宁边区部分》是全面论述边区税收的著作；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编的《陕甘宁边区金融史》分5个阶段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做了研究。除专门研究边区经济史的著作外，其他一些著作也涉及对边区经济史的研究，如房成祥、黄兆安主编的《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雷云峰等主编的《陕甘宁边区史》、宋金寿主编的《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清庆瑞主编的《抗战时期的经济》等。

同时，学者还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文，散见于各种报刊资料，许多研究都是具有真知灼见的创新之作。这些论著涉及边区的经济结构、农业、工业、商业、金融、税收等方面的内容。刘昭豪对边区的经济结构做了研究，认为边区经济主要由政府或机关、学校、部队经营的公营经济，建立在私有制上的集体活动的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地主经济五种经济成分组成。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大致是：个体经济占首要地位，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第二位，公营经济占第三位，合作经济占第四位，地主经济占第五位。边区的经济构成决定了边区的经济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质上是“新资本主义经济”。①李祥瑞认为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把广大农民、手工业者，以及部队、机关、学校人员组织起来，开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组织商品流通，调剂有无，这对于发展边区经济，战胜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实现丰衣足食，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②

20世纪90年代，边区的私营经济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许建平认为边区私营经济的发展说明边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已经走向成熟。新民主主义经济允许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育有很强的适应性，能促进生产率的发展，为社会创造财富，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具有积极的意义。③王致中、魏丽英认为在经济建设中，边区政府在鼓励私人商业资本的发展中，除反对放任自流、囤积垄断外，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国家资本在整个市场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边区私营工业的发展，其资本来源具有多元的复杂性质，并非完全是私人资本，这是边区私人资本主义性质工业的一个重要特征。④

①《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构成及其性质和特点》，《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4期。

②《合作社经济在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中的地位》，《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④《伟大的历史性创造——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工商业政策和实践》，《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减租减息是抗日战争时期最基本的土地政策。肖一平、郭德宏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一文虽然研究的是全国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但对研究陕甘宁边区的减租减息具有指导意义。作者认为，抗战时期土地政策的改变，是中共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向国民党做出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上的让步。没有这个让步，就不会出现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成绩巨大，意义深远。首先，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使广大农民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翻了身，大大巩固了工农联盟；其次，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使广大农

民踊跃参军、参战、参政，有力地支援了民族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第三，发展和巩固了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了各阶级共同抗日；第四，大大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根据地农工商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长期抗战；第五，引起了农村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为将来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①汪玉凯的《陕甘宁边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历史考察》是研究边区减租减息政策的重要论文。他指出，边区的减租减息，对于已经分配了土地的地区，主要是调整贫、富、中农之间的租佃关系；对于未分配土地的区域，则主要是削弱封建剥削关系，保证农民的租佃权，从而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支援抗战，是执行减租减息的重点。1940年前，边区的减租减息并没有真正动手去做，原因是：从客观上看，抗战初期边区部分地区还存在着国民党政权，给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从主观上看，抗战初期党内曾经发生过的右倾思想影响了减租减息的贯彻执行，有些党员干部怕因减租减息得罪了地主，妨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往往把减租减息停留在口头或书面宣传上。1941年，边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颁布标志着边区减租减息政策趋于完善。1942年，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颁

①《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

布后，减租减息在边区得到了彻底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不仅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削弱了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农村土地关系的变化。①孔永松在《试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特殊土地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共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时地主动提出把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转变为国民党政策法令中曾提出过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这是一个很大的让步。但这又是有条件的让步，是在不改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通过抗日政府的法律、法令削弱封建势力，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种特定的历史阶段所实行的特殊的土地政策，是综合“革命”与“改良”的两重性政策。它的革命性在于没有放弃解放农村生产力这一根本的方面，而只是改变解放农民土地问题的方式，使土地问题的解决服从于民族战争的需要，是在一贯坚定的土地政策之下的自觉让步。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边区的地主减少了对于中共发动抗日的阻力。它的改良性在于它只是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彻底地推翻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②

农业是边区经济的主要部门，受到学者的关注比较早。张扬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文章主要论述了边区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边区农业生产成绩和政策。他认为虽然抗战时期，边区关于农业生产的某些方针政策和发展生产的具体措施，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但是他的许多方针政策是实事求是的，是总结了群众的丰富实践经验，又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是符合农业生产客观规律的，因而具有普遍的长远的指导意义。③抗战时期，边区政府为了发展农业经济，制定政策，发放农业贷款，阎庆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他认

①《陕甘宁边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1983年第3期。

②《试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特殊土地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4期。

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为边区农贷的特征是：(1) 贫困的勤于农业生产的农民是边区农贷发放的主要对象，体现了农贷支持贫困农民发展生产的原则；(2) 政府发放农贷与农民自筹资金相结合；(3) 采取了以实物放贷和实物收贷的方法。农贷在发展边区农村经济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变了边区农村的阶级结构，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农贷把边区金融事业同农村经济结合起来，推动了金融、贸易事业的发展。①阎庆生认为可耕地的开发和利用，是抗战时期边区一项重要的农业政策，它对边区经济发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都起了积极作用。但同时客观上也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在开发和利用可耕地时，没有来得及考虑生态问题，使大片森林遭到砍伐，围猎活动使一些野生动物在边区绝迹等。当然，由于战争、国民党的封锁而造成的经济困难，使得生存成为当时边区优先考虑的问题，

忽略生态问题也就在情理之中，加上人们当时保护生态的意识不强，因此，在开发利用可耕地时，没有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开垦，致使出现了毁林开荒的现象。要吸取历史的教训，在发展经济时，一定要注意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②“奖励移民”是边区经济建设中又一项重要的农业政策，孙业礼对此做了论述。认为边区的移民包括四个部分：从外部迁入边区的农民；从国统区和沦陷区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和工人；来边区做买卖的商人；边区内部从人口稠密地区迁到人口稀少地区的农民。移民不仅推动了边区农业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③

边区的工业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抗战结束时期，已形成一定的规模。阎庆生认为边区工业建设大致可以分为初创和起步(1937—1940年)、稳步发展(1941—1942年)、工业品可以达到基本自给或半自给(1943—1945年)三个阶段。④侯天岚认为“集中领

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贷》，《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

②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可耕地的开发和利用》，《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③ 《论抗战时期移民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西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④ 《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工业建设》，《西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

导，分散经营”是边区公营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方针。①阎庆生还论述了边区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政策。②

李祥瑞研究了抗战时期边区的公营商业。认为边区的公营商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37年7月—1940年12月是自流的、单纯采购性质的阶段；1941年1月—1942年12月是从自流向管理贸易的过渡阶段；1943年1月—1945年8月是从部分管理到全部管理阶段。边区公营商业分为政府统一经营的和各机关、部队、学校分散经营的两类。③陈志杰对边区的公营商业进行了研究，认为皖南事变后，边区的公营商业由供给型转为经营型，虽然在实际运作中存在不少问题，但其经营方式、手段得以进一步丰富，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客观上为克服经济、财政困难发挥了更大的作用。④

边区的金融业也受到学者的关注。李祥瑞认为边区的财政、金融和生产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经济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银行事业占有显著地位。边区银行事业的发展，对于打破外部封锁，发展边区经济，支持财政，稳定金融，平抑物价，夺取抗战的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⑤姚会元认为边区银行的业务范围是多方面的，并不只局限于金融，它除从事金融业外，还兼管商业和贸易。⑥任学岭分析了边区政府在边、法币斗争中所采取的措施，总结了边、法币斗争的历史经验。⑦任学岭还对“光华代价券”、“边币”和“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的发行情况作了论述。⑧高西莲认为由于边区对国统区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和贸

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工业》，《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②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资本主义工业》，《固原师专学报》1999年第5期。

③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商业》，《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④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的构成与经营》，《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

⑤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银行》，《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⑥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事业》，《党史研究》1985年第3期。

⑦ 《论陕甘宁边区的边、法币斗争》，《延安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⑧ 《简述陕甘宁边区的货币》，《延安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易上的关联性，使得边、法币比价和物价问题从边币一开始发行，就成为困扰边区金融工作的首要问题。造成边、法币比价和物价波动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①

财政与税收是边区经济史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星光认为根据地财政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937—1939年是根据地的财政初建，主要工作是筹粮筹款，征收田赋、公粮、税收和发行公债等；1940—1942年是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边区党政军民学“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经过军

民的艰苦努力，终于克服了困难，渡过了难关，并在实践中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1943—1945年是财政经济好转时期。②刘秉扬则认为抗战期间边区的财政建立与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抗战开始到皖南事变，是边区财政的创建时期；第二个时期，皖南事变后到抗战胜利，是边区财政进一步发展及财政政策日趋成熟时期。③李俊良认为边区的工商税收是随着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④章蓬、齐矿铸总结了边区农业税收的特点。⑤

①《简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比价与物价问题》，《延安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②《中国抗日根据地的财政》，《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

③《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财政》，《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④《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工商业税收》，《西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⑤《陕甘宁边区农业税收的特点和作用》，《人文杂志》1998年第4期。

尽管如此，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掘和时间的推移，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的许多问题还有必要进行新的或者是更为深入的研究。近几年来，笔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如《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①、《边钞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事业》②、《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盐业》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④、《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村经济研究》⑤、《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税收问题研究》⑥、《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政策与土地立法》⑦、《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的几个问题》⑧、《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⑨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我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史中的一些问题的认识，使我有写一部新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的想法。

①《固原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经济史》1998年第4期。

②《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经济史》1999年第4期。

③《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

④《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⑤《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⑥《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划时代的历史转折——“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3期。

⑨《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二、关于边区经济发展史的分期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历史的分期，学术界通常采用三分法，即1937年至1940年，休养民力时期；1941年至1942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1943年至1945年，生产大发展，从半自给争取达到全部自给时期。最早把边区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的是毛泽东，他在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指出：“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的第一个阶段中，我们取之于民是很少的；在这一阶段内，大大地休养了民力。在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为第二阶段，人民负担加重了。一九四三年以后，可以走上第三阶段。”①这一论断对以后边区经济史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一编《总论》就采用了这种分期，绝大多数学者都是按这个分期来研究边区史和边区经济史的。最具典型代表的是星光、张杨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就是按照这种分期来布局的。所以，三分法似成定论。

通过多年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史的研究，我觉得，如果以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为界，把边区经济发展过程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更符合当时边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皖南事变不仅给第二次国共合作和中国的全民族抗战蒙上了阴影，而且对边

区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影响更大，把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皖南事变以前，从1939年开始，顽固派虽然开始封锁边区经济，边区的外援还没有完全断绝，边区内外商人可以自由出入，进行正常的商业贸易。但皖南事变后，顽固派彻底封锁了边区，直到抗战胜利一直处在被封锁的状态下。因此，在这两个阶段，边区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财政经济的总方针，皖南事变以前，边区的财政经济政策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这个政策的基本点是争取外援。②皖南事变后，边区财政经济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其基本点是发展经济，直至抗战结束，这个方针没有发生变化。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0页。

②黄正林：《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固原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

就边区经济发展的全部过程而言，皖南事变前，是边区经济恢复和家业的创立时期。这个阶段，边区的传统经济部门农业逐渐地得到了恢复，而工业、商业、税收、金融都在草创时期，基础是非常薄弱的。皖南事变后，为了克服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把边区的经济建设当做头等大事来抓，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建设的政策和法规，边区的经济法规80%以上都颁布于这一时期，并且不断得到了修正和完善。①正因为如此，推动边区经济逐年发展，到1944年时，边区的经济体系基本建立起来。边区有了一整套完整的经济管理制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工业体系、商业体系、税收体系、金融体系等。如果把皖南事变后边区经济发展分成两段，就割裂了边区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经济发展过程的完整性，许多问题的研究也显得支离破碎。也就是说，不利于我们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史进行系统地 and 全面地研究。所以，本书就是按照两个阶段这样一个框架和体系来进行研究和撰写的。

三、关于边区的经济成分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性质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包括了三种主要形式：“一是集体经营的国营经济；二是建立在私有基础上的集体活动的民营经济；三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起来就是新民主主义。它并不消灭地主阶级，而只限制地主阶级的剥削，它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②如果再分得详细一些，就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和受到限制的地主经济。在边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各种经济都有其合法的地位。边区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不仅保护和支持国营经济的发展，更

①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②《整财问题报告大纲》（二）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文注简称《史料摘编》）·工业交通》第3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8—639页。

重要的是保护和支助了私营经济的发展，在边区，“私有土地、租佃权利、债务、私有财产、私营厂矿及私营商业等都受到法律的保护，边区政府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对私营经济在贷款、原料、税收、销售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从法律上得到确认，不同的经济成分都得到有效的保护。”①在边区政策韵保护和支助下，各种经济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国营经济。国营经济在边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对其他经济起着领导作用，特别是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财政金融和对外贸易牢牢地掌握在国营经济手中，在平抑物价和稳定金融方面发挥了其他经济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营经济和其他经济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辅助而不是相互牵制。”②正因为这样，边区经济才能够稳步地向前发展。

（2）合作经济。合作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用群众集体经营的方式以发展国民经济，又具有统一战线的性质，“不论是地主、商人、农民的资本，都可以自由进来，目的是建立民主的经济，人民大众的经济。”③抗战时期，边区的合作事

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合作经济，有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商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不仅如此，在机关、部队和学校的自给性生产中，也出现了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合作经济在边区的经济发展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43年10月，他在边区高干会上指出：“今年边区在发展生产上，又来了一个革命，这就是用合作社方式，把公私劳动力组织起来，发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大大发展了生产。… 这办法，可以行之于各抗日根据地，将来可以行之于全国，这在中国经济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④

①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②《边区工业的发展》，《解放日报》1944年5月1日。

③高岗：《合作社要为群众办事》，《解放日报》1944年7月2日。

④《毛泽东选集》卷5，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89页。

(3) 个体经济。个体经济是发展边区经济的主要力量，包括了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农业是边区的传统经济部门，又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以个体家庭生产为主要组织形式。通过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边区的土地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占人口80—85%的中农与贫农，占有80%左右的土地，“这就是边区土地关系的特点，这个特点归结成一句话，就是‘耕者有其田’！”^①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在边区政府的帮助下，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很大的提高，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使其成为边区经济的支柱产业。个体手工业是边区工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边区工业产品的自给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家庭纺织业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虽然家庭纺织业在生产技术上很落后，但它由于是一种付[副]业，所以能把二十万上下这样广大的妇女力量组织起来从事纺纱织布，能生产十万匹以上的大布，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价值仅次于农业生产。其次，作为大量存在的是各种小手工业作坊。这些小手工业作坊有一种仍然当作农业之付[副]业或城镇小商业相联系而存在，其人数虽不很多，但分布极广。它同农业生产配合，生产人民经济生活中一部分必需品，在大工业未建立之前，它是不可缺少的。”^②这个评价是很准确的。除此而外，边区农业生产工具如犁、铧、耩、锄头、镰刀、铁锨等，运输用的大车、鞍架、皮革、口袋、牲口蹄掌等以及在边区各地市场上出售的各种生活用具，大多数出自于个体手工业。^③个体商业的地位虽不像农业和个体手工业地位那样显著，但它仍然是边区商业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繁荣边区农村市场，稳定金融方面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①谢觉哉、左健之：《关于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的几个问题》，《解放》第119期。

②贾拓夫：《关于边区工业问题的研究》1945年，《史料摘编·工业交通》第3编，第529—530页。

③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手工业》，《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4)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抗战时期，边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鼓励其发展的政策。毛泽东指出：“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④刘少奇也指出：“我们应该帮助私人多办一些厂，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多了，对我们的经济是有好处的。”^②边区的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农业资本主义(即富农经济)和工业资本主义。尽管它不操纵国计民生，但它却是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样为边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5) 地主经济。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土地政策是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对于陕甘宁边区来说，一部分地区经历了土地革命，地主经济被消灭了；一部分地区没有经历土地革命，地主经济依然存在。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指出：“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郃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家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与债务关系

加以合理的调整。”^③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又明确指出:“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并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经济一致抗日。”^④边区在保护地主经济的同时,又通过减租减息的方法,使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1061页。

②《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5页。

③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42—643页。

④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的土地关系发生了变化,有相当一部分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地主经济由此而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如绥德分区经过彻底减租后,地主土地的50%—80%转移到农民手中。^①所以,在边区的经济成分中,地主经济是最薄弱的。

四、关于边区的经济结构

抗战前,边区没有近代机器工业,旧有的手工业也遭到较大的破坏,农村金融枯竭,商业萧条,整个边区的产业结构只剩下不再向前发展的单一的农业经济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推动边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使边区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布局,形成了农工商贸为一体的多元产业的经济结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业结构上,形成了以农作物为主、经济作物并重、农牧兼营的经营格局。边区在发展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十分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当时提倡种植的经济作物有棉、麻、桑、蓝等。棉花是边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1939年恢复种植后,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和棉花自给的需要,种植面积不断扩大,1939年至1945年棉花的种植面积分别是3767亩、15177亩、39987亩、94405亩、150473亩、295178亩、350000亩。^②特别是1943年至1945年棉田面积分别占到农业耕地面积的1.1%、2.2%和2.4%。由此棉花也就成为边区农村的一项主要收入。以1944年延安市场物价计算,10斤棉花值小米1.3石,每斤棉花值边币4500

①清庆瑞:《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471页。

②《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87页。

元,而当年的棉花产量是3044865斤,这样,仅棉花一项收入就相当于小米395832石,占1944年粮食产量的21.8%,或等于边币137亿多元,折合券币6.85亿元。^①特别在延属、绥德重点植棉地区,棉花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半数以上,而且棉纺织业成为当地农民的主业。桑蚕业是边区提倡的另一农村副业,1941年,清涧、吴堡、安定三县产茧45000斤左右,可产丝3000斤,价值法币约45万元。^②1943年,蚕桑业发展更快,仅清涧一县有大桑树27279株,小桑树13321株,新栽桑树20459株,全县有养蚕户4379户,占全县总户数的35%,共养蚕350石,收茧30904斤。^③抗战期间,边区畜牧业也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使畜牧业在边区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仅1944年统计,边区共有牛223058头,驴180826条,羊1954756只,还有少量的骆驼、骡、马等。牛、驴、骡、马等大家畜主要用于耕地和运输。而羊及皮毛则为边区的主要出口商品之一,仅1944年全年出口羊约87533只,羊毛88066斤,羊皮29000张,羔皮69000张。全年总计牲口皮毛出口价值边币约11亿元。^④

①阎庆生、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村经济研究》,《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②甘露:《蚕桑考察团总结报告》1941年12月,《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

③张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④《边区羊子的发展问题》1945年2月，《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93页。

第二，工商业成为边区的主要经济部门，形成了农工商贸相结合的产业结构。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工商业的兴盛与边区所处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密不可分的，由于国民党的全面封锁，边区为了生存，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工商业体系，以达到自给的需要。由此，各种工厂、手工业合作社、作坊、贸易机构、商业网点、运输企业等在边区城乡广泛地建立起来。工业方面，边区建立了纺织、造纸、印刷、化学、盐业、石油、炼铁、煤炭、被服、机械及军事等工业，对当时的边区来说，工业门类已经比较齐全了。同时，各种手工业合作社、作坊和个体家庭手工业也发展起来，成为公营工业不可或缺的补充。边区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业部门，如绥德的纺织业、三边的盐业和毛纺织业、庆阳的制毡业等。工业的发展，不仅结束了边区没有近代工业的历史，而且边区的许多工业品已经能够自给。所以，工业在边区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商业方面，建立健全了商业贸易制度，产生了股份制的贸易公司，广大城乡消费合作社、集市等商业网点星罗棋布，建立起了边区商业贸易体系。在边区，许多群众不再靠单一的农业而生存，从事工商业的群众越来越多，出现了从事工商业的劳动大军。民间纺织业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凡是植棉的地区都发展起了家庭纺织业。如绥德的韩玉英，中农家庭，全家总收入中，农业收入占48.79%，纺织收入占51.21%。①米脂县远志山是一个仅有30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家家户户都参加了纺织，全村58个老少青年妇女，54人参加纺织。②家庭手工业发达的地区，商品经济也很发达，如米脂县远志山的产品五分之四向外推销。绥德枣林坪福乐村，全村45户人家，都是贫农中农，全部参加纺织，布匹产量的三分之二向外出卖。③这些都说明了边区群众的经济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工商业在边区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抗战前相比，边区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工商贸相结合的产业结构已经形成。

以上是我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的基本认识，也是本书所贯穿的主要思想。

近些年来，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已有些沉寂了，凭我个人的学力和资质无法打破这种沉寂。我花了近5年时间完成的这本书，只是我近10年来研究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的一个总结。在研究与写作中，我尽量扩大视野，收集资料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对一些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但是，历史学毕竟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特别是对于经济史的研究需要广博的知识和理论来支撑，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甚至有些题目不敢下笔，使本书留下了很大的缺憾，也使书中谬误难免，希望得到行家们的批评指正。

①《陕甘宁边区的纺织业》1945年1月，《史料摘编·工业交通》第3编，第55页。

②陈希：《米脂远志山的家庭纺织业》，《解放日报》1945年6月9日。

③《陕甘宁边区的纺织业》1945年1月，《史料摘编·工业交通》第3编，第55页。

责任编辑：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1 2 3 4 5 6 7 8 9 10